

# 另类资源与视角<sup>1</sup>

## ——女性主义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启示

潘家恩

---

<sup>1</sup> 本文深受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课程《女性主义与文化政治》的启发，并由陈顺馨博士提供和平妇女“骗局”风波的部分资料，在此特向任课教师陈顺馨博士、戴锦华教授深表谢意！

第一次接触女性主义，是在一次社会性别培训会上，除了大部分的女性参与者外，我们四位男同胞被戏称为“四根草”。既是她们和自己都乐意开的玩笑，也是特殊待遇的体现，虽然是以“少数人”的身份出现，却没有感受到歧视与排斥，相反却能享受到一种特殊的“关照”，以致当时竟有点暗暗的“优越”。同时主办方也十分高兴，因为男性的参与使得培训有了更好的效果。正是多年前的这一经历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姐妹情谊影响下的培训氛围可以是如此的温暖，同时性别原来与社会是如此相关！

但随着培训所带来兴奋感的消退，通过对自己身边的观察，慢慢发现女性主义目前正成为一种“前卫”的学术时尚，它和 80 年代以来各种从西方引进的学术思潮一样，在各大高校迅速普及，并成为可以完成学位或申请课题的新兴学科。

而在各种实际工作中也逐渐有机会接触到女性主义，特别是其在社会运动中具体运用的社会性别。但许多时候它却变成了一种修辞，一个为提高 NGO 或草根社区项目获得资助的筹码，一项民间组织项目申请培训课中的实用技巧。无论是那些经由各国际组织培训引导出来的国内 NGO 从业人员，还是长期和外来项目打交道的社区民众，社会性别这样一个角度无疑是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它既是项目汇报或验收时需要着力体现的，更是外来专家快速评估社区项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总之，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已经不加思索或心知肚明地成为当前主流 NGO 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具体到社会性别的各种培训和活动中，很多人更将其程序化、意识形态化、教条化和标签化。它似乎成为某种程度上的预设性存在——社会性别不是作为一种新的视角或资源，而只是让我们都加入一场发现性别歧视的“活动”中，既然是这样的功能，当性别不平等得以指认，“发现之旅”也随即宣告“成功”。

而对于一些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 NGO 工作者，由于当下中国 NGO 发展自身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出现了“自我刻板化”的问题——只要一开口，似乎听众就知道在讲什么了！这一困境十分“中国特色”地呼应了英国著名文化学者泰瑞·伊格顿所言，“（当前的）女性主义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模范<sup>2</sup>。”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欧美女权运动与女性主义理论本来就是作为欧美现代性规划建构内部的一次“内爆（implosion）”，一次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话语延伸，一次针对着现代化规划核心、现代性话语的延伸和实践<sup>3</sup>。它从一诞生就并不如此的“温和”及工具性，而是十分有力地介入着社会，并不断的通过自我翻转、自我批判和自我分裂来一次次重新获得新的批判资源。

---

2 泰瑞·伊格顿著，李尚远译，《理论之后》，2005，台北：商周出版，第 26-27 页

3 戴锦华，2006 年，《性别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第 19 页

所以，当下我们在“学院里、外”所看到的女性主义不仅不无遗憾地失去了其在西方语境中的批判力度，也同时脱离忽视了中国的更大社会现实。以致其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都大打折扣，而似乎只成为某种略显时尚的包装和点缀。

当面对剧烈变化和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现实，女性主义如何可以作为一种资源和视角，它不止于去发现一种父权的存在或事实（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层面，可能将会让她们，特别是农村妇女更加有失落/痛苦/自卑等方面的感觉），而是让其成为一种前提与起点，进而争取社会运动空间的更大打开。

具体到女性主义在中国的脉络、问题与困境，很多方面和笔者参与的乡村建设实践有相近之处。本文希望结合各种实践例子，尝试做一些比较和分析，以进一步引出一些积极的建设性行动。

## 中立与敏感

虽然接受过很多次的社会性别培训，但印象最深的还是这样的一种归纳——目前我们对社会性别的认识，已经或即将经历“盲点、中立和敏感”这三个阶段。与其说其清晰形象的总结让我印象深刻，不如说，这三个归纳也将我们社会运动一线工作者所从事工作的意义、自我定位及需要面对的各种张力与内在困境十分准确地进行了总结，而不管我们具体是哪个领域。

回到社会性别，对于现在很多人（特别是 NGO 圈内）来说，大家至少在表面上已经逐渐消除了歧视和偏见，摆脱了所谓的性别“盲点”阶段，因此自认为已经自然而然地达成了“中立”和“客观”，并以此为基本的满足。然而如此“中立”却仍然可能让我们掉入另一个更为隐蔽的“陷阱”，它将在“中立”的掩护下在我们身上强化和复制主流社会的更大偏见。在此我将举三个例子进行说明。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无疑给了我们很大的幻想空间，它带给我们技术将可以让妇女们摆脱沉重的家务而获得解放这一莫大希望。但正如有学者在《设计的歧视：“男造”环境的女性主义批判》中所指出的，“千万不要被这种狡诈的景象给愚弄了：一个充斥科技装置的解放未来。这种景象不过是父权体制的诡异。科技当然免除了许多家居和工业劳动的沉重体力负担，但它从未使女人或男人免于性别角色的桎梏……电子通讯可能替代了面对面的接触，但可能也再度将女人孤立于家中……女人可能发现她们再度成为郊区镀金铁笼中的囚犯，她们的双足被电缆、光纤和隐形的电磁波锁链所困。此外，利用家用电脑去付账、订购食品杂货和做研究，势将削减传统上由女性担任的付薪工作，包括银行出纳员、杂货店雇员、记账员和图书管理员等<sup>4</sup>”。除此外作者还敏锐地指出，**建筑和空**

---

4 Weisman, Leslie Kanés (韦士曼), 王志弘等合译, 1997, 《设计的歧视：“男造”环境的女

间的安排基本上也是既有之社会秩序的表现。它并不容易转变，除非生产它的社会有所改变<sup>5</sup>。

通过这样的例子，我们将看到：看似“中立”和“无性别”的技术，可当其内在于并不十分中立的现代父权社会体系中，其将实际达成“有性别”的效果，只是这样的秘密让我们并不可以从表面的标签和属性中进行指认。

同样，对于和“中立”一样充满神话色彩的“平等”，正如香港学者文思慧所指，“（如果）没有连线自觉的意识，便难以看清那些凌驾性的权力实体（如庞大的资本结集体），因而会掉进将‘平等’争取化成让女性与其它族群一起从属于那庞大的权力实体，结果是大家一起平等地被奴役……举个例子说，近年美国教育要大力扭转资讯科技学习对女学生来说并不太有吸引力的偏差，特别设计了不少让女学生感兴趣和能够有学习成就感的教材、教学法，主要是要让更多女性长大后进入资讯科技行业，改善行内人员不足和阴衰阳盛的情况。表面上，这是个‘平等化’的趋势。然而，这种培训的目的，不外乎要让更多女性利用资讯科技，制作更多吸引其它女性使用的商业网站，以促进更多消费……因此，平等机会不是目的，平等机会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才最重要。”<sup>6</sup>

同样生动的例子，它就像“蒙太奇”所造成的“1+1>2”效果一样，提醒我们不得不保持充分的“敏感”与自觉。除此外，“敏感”的必要性还随处可见于我们的各种农村工作中。笔者所接触到的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第三期青年实践者刘敏，曾回忆自己一次十分有趣的经历：

“我（青年实践者）和另外一个同事去一个项目村做三年规划，开会期间一位村里的妇女A提出了想识字的渴望，她说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有这个机会。会后我、她、还有另一位村里妇女B聊天，这位妇女B参加了我们机构在桂林的一次社会性别培训，我把当时拍的一些照片拿了出来，其中有一张是我们在演小品，B演做针线的奶奶，我演写作业的孙子。在随后的会上，提出想识字的这位妇女A说自己不喜欢这张照片，为什么我们就做针线，你们写字，为什么我们不写字？……”

经过了这一尴尬的场景，我（青年实践者）自我反思：‘在此我想说需要对工作中的细节加强敏感，我真的没想到照片场景对她会有那么大的触动，我们需

---

性主义批判》，台北：巨流图书公司，第233-234页

5 Weisman, Leslie Kanen (韦士曼)，王志弘等合译，1997，《设计的歧视：“男造”环境的女性主义批判》，台北：巨流图书公司，第253页

6 文思慧，《女性主义与运动连线——必要与实行》，选自《差异与平等——香港妇女运动的新挑战》，新妇女协进会、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出版，2001，第69页

要对一贯的思维定势与角色定位保持敏感！<sup>7</sup>。”

这样普通的案例其实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及生活中经常发生，它值得我们去不断反思社会秩序在自己身上的内化与痕迹，以及“我们”作为携带着项目并受过较高教育的外来者和“他们”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当“我们”在与“弱势群体”一起工作时的一言一行，表面上可能只是遭遇了热情或者冷漠，但背后却一定是无数村民/干部们很“敏感”地在观察/试探我们，而我们自己，则经常不自觉的复制着社会主流的性别/权力角色，所以我们的确需要注意细节，更要十分敏感地警惕自己的习惯。

除以上三个例子，从更大处说：女性可能可以暂时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一旦社会危机发生，最先牺牲的还是女性，无论是国企改革时期的下岗还是当前金融危机下的裁员，因为作为社会区分和矛盾转移的基本逻辑及标准没有发生变化。同时我们需要承认，很多新的歧视已经不是发生在个人之间，它已经深深地成为包含你我在内的某种集体文化。所以，在这样一个父权已经内化于社会各个角落及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成员时，所谓“中立”不过是一种托辞及自我安慰甚至自欺欺人之举。

那我们要“敏感”什么？一方面，它要求我们自觉于其间交织的各种利益关系，看到现实社会中复杂的经济/文化/政治面向以及强大的主流观念影响。因为性别问题从来不会单独存在，我们不能抽离各种背景、社会脉络，男女关系而孤立地谈女性。

另一方面，就如学者陈顺馨所指出的，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差异”是一个比“平等”更为重要的概念<sup>8</sup>。我们还需要“敏感”地去发现的，正是在平等和中立的掩护下，“差异”所可能遭遇的漠视与强化。

而就在这些同样需要“敏感”对待的群体里，女性或许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被主流固执地指认为弱势群体的符号，“她”可以是女人，也可以是任何一个长久地被无视、被轻蔑、遭放逐的社会群体<sup>9</sup>。

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中又何尝不面临着相似的处境与复杂之利益关系。比起女性被作为“自我的他者”而进行内在建构之不同，农民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从一开始就被排斥于现代化之外，农民一开始就作为“他者的他者”，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要摧毁和克服的事实，正是有了对“农村、农业及其所带出的传统生活方式”之排斥，才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之兴盛。

而无论是建国初年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还是为提高效率的“甩包袱”改革，

---

7 参见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第三期青年实践者刘敏 2009 年 1 月月度报告

8 陈顺馨，《女性与差异政治的实践》，《读书》，2006 年 5 月

9 戴锦华，《温柔的挑衅——象征与真实的行动》，《读书》，2005 年 10 月

农村和农民无疑都是牺牲者中的“第一梯队”；同时，当推广生态农业或生态建筑时，我们需要“敏感”于其间已经固化的商业利益；当全社会都掀起“三农”热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敏感于其对“苦难”的批发和零售；当我们谈乡村时，更需要“敏感”于整体社会脉络和此消彼长的城乡关系。

再进一步说，我们需要以同样的敏感，对村庄的各种权力关系，对社会对待农民态度的变迁，对社会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对社会思想界及全球资本与社会运动的互动，对国际发展理论的殖民脉络与后冷战背景……

### 反本质？策略性的借助本质？

似乎“敏感”也是第二波女性主义在二十世纪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断前行和“裂变”的一个基本动力。正是对不同性向的认识、尊重和敏感，于是出现了“同志”理论；正是对生态问题的敏感，于是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正是对第三世界劳动妇女的敏感，于是出现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脉络下的女性主义……

而这些“敏感”也同时伴随着对所谓“本质”的不断质疑与挑战。这样的质疑和挑战不止于对女人，同样也适用于男人，更确切的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各种批判理论基本都是一种“反本质主义”，它有力的质疑和颠覆了传统的话语秩序。

但在几千年逐渐形成并由现实中的各种利益不断加固的社会主流面前，如此的质疑与反抗立场，比起其间某些“平权”目标本身来说，无疑更具威胁性。

既然“性别”作为某种少数人或次要问题的指称，它可能经常需要面对这样的一种指责——“没有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没有从整个文明的角度出发，只关心女人的问题！”。正如戴锦华教授根据自己作为一位女性学者所亲身体认而指出的，“在所谓‘启蒙’时代或人道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中，女性主义的立场，意味一种偏狭、‘偏见’，一种拒绝超越、或无法超越的‘少数人’的‘一己之私’<sup>10</sup>。”

而当男性学者站在自己性别立场上发表相近言论时，决不会遭到类似的指责，因为“男性话语和父权制结构也始终是以‘人类’的形象出现<sup>11</sup>”！而且，从某种角度说，从来没有人能代表全人类！

更值得深思的则是其中可能包含的那种逻辑，推到极端可能是——如果我们都容忍同性恋、女性生育自主，那么如何保证生育率，如何确保富国强兵和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

同样的逻辑也发生在人们对乡村建设的揣测与误读中。当我们开始反思现代

---

10 戴锦华，《岁月留痕——西蒙那·波伏娃在中国》，《书屋》，2007年第10期

11 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农业对环境和生态造成的破坏问题，并尝试做出一点改进时。就马上会被问到，如果按照你们这样，全球会出现多少灾荒？且不说刚刚打开的空间将马上被以全人类的道德高度及各种正义名义所包装的线性思维所迅速关闭，提问者其实心目中早已有答案，除了不可能花基本的耐心去调查研究其间的各种可能性外，这样的提问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十分明确的态度——这里不可能有另外一种“别样选择！”（there is not alternative, 在西方批判理论中缩写为“TINA”）

而“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和传统无疑给予女性主义在如此“犬儒”的社会中的某种批判位置，并让女性主义在不断反身中完成自我解构成其为可能。然而这样的“反本质本质”也面临着新的内在困境，因为比起第二波女性主义之前的“平权”目标来说，前者的诉求和立场无疑更为清晰简单，而后者不仅立场和诉求多元模糊，它无疑更扰乱了社会常年形成的秩序、习惯与常识，其必将遭到更为有力的反扑与放逐。

同时，我们更要警惕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如何防止如此“反本质”成为一种“姿态”而重新僵化并陷入另一种的自我本质主义陷阱？正如香港学者文思慧所指出的，这样一种“以重新发现女性的特有观点与角度为运动根基、正面彰显女性各方面的思考及表现的特色，又是否跌入将定型化的女性特色作为遮掩其它压迫（如阶级、种族压迫）的工具，以单一的女性身份去隐瞒女性中也有压迫者<sup>12</sup>？”

我们需要改善女性的位置并让其拥有实质性改变自己生活的力量，而不是教条似的“清高”及以追求所谓“纯粹”为目标的道德自恋。也即，我们需要利用“反本质主义”去开拓和创造，而非一种自我设限。

从另一角度说，对受压迫的人而言，很多时候“本质主义”更易建立弱者的内部认同，也不失为一种强有力的资源及反抗手段。那么，如何让看似矛盾的“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都能成为我们寻求“别样选择”的武器和资源！

为了回应全球范围的这种两难困局，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创造性的提出了“策略性的借助本质主义”，她同时还指出本质化与非本质化可以并存——即女性作为拥有某些特质的主体，是一个可以被“实化”的族群，这种“实化”其实是建立（向主流的霸权力量）抗争的重要力量所在，这个意义上的本质主义并不排斥对某一项本质化的批判。换言之，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应有可能成为批判与再批判的原则与策略<sup>13</sup>。

---

12 文思慧，《女性主义与运动连线——必要与实行》，选自《差异与平等——香港妇女运动的新挑战》，新妇女协进会、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出版，2001，第65-66页

13 文思慧，《女性主义与运动连线——必要与实行》，选自《差异与平等——香港妇女运动的新挑战》，新妇女协进会、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出版，2001，

在此，我们尝试以在女性主义内部多被归类为“新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例，讨论如此“调和”的有效与限定。

就像有论者所指出的：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思想与女性主义的连结，包含了不少新运动领域的开拓<sup>14</sup>。这无疑也是它对社会运动的重要贡献之一。

但生态女性主义者与主流环保人士之不同在于，对生态女性主义者而言，我们不应视自然为相对于人类的存在，而使之沦为环保英雄投射浪漫之爱或者拯救保护的对象，她们认为人与自然乃至一切生命形式都息息相关，难以分割，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因而不能容许任何形式的压迫……所以，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关心公害防治与生态保育，更进而探讨女性与自然双重被宰制之间的意识形态关联性，以此企图拆解所有的宰制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永续共存。<sup>15</sup>

生态女性主义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即其对“二分法认知”的扬弃。因为二分法非仅抹煞了差异物之间的连续性，更将对立二元层级化，使之具有排斥而非包容的效果，甚至建立宰制和敌对的关系。它赋予双方中的某一方有优于另一方的特权，如男性优于女性，文化优于自然，科学优于魔幻<sup>16</sup>。正是在这种二分法的认知架构下，人与非人亦一分为二，因此它才有助于合理化人宰制“非人”之行为。<sup>17</sup>

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其可能存在的自我限定也是十分明显的：和其他大部分女性主义思潮难以摆脱的宿命一样，它更容易滑向西方发达国家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用以强化女性特质，以争取更大权力和空间的手段，然而同时，不断凸显“推摇篮的手拯救地球”这样的新型神话也掩盖其他的不公与压迫。正如台湾学者钟秀梅所指出，“生态女性主义内部也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建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和哲学基础之上的自由派生态女性主义以自身利益的权力意识为重要考量，她们不反对市场与父权资本主义，并用理性与科学的观点来经营生态。而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父权文化定型化了妇女与环境的关系，由于二元论的价值观，认定男性联结理性、心灵、文化，女性等同于情绪、肉体、自然，后者是属于较低等的，因此，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自然化了妇女与环境与社会的关系<sup>18</sup>”

所以，生态女性主义一直是某种难能的突围，但一张更大的网或许早已设

---

第 65-66 页

14 文思慧，《女性主义与运动连线——必要与实行》，选自《差异与平等——香港妇女运动的新挑战》，新妇女协进会、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出版，2001，第 67 页

15 顾燕翎主编，1996，《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台北：女书出版，第 262-267 页

16 (美) 罗斯玛丽 帕特南 童着，艾晓明等译，《女性主义思潮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372 页

17 顾燕翎主编，1996，《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台北：女书出版，第 271 页

18 钟秀梅，《生态是永恒的经济》，《读书》，2006 年 5 月

好。

再联系到“三农”问题与乡村建设，如果说“反本质”让我们看到所谓“女性特质”不过是男权社会特殊考量后的有效建构，那么长久以来的农村或农民形象难道不也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建构？

农民是否有本质？无论是晏阳初先生当年的“愚、穷、弱、私”四大归纳，还是社会主义写实文学中农民的创造性与革命品质：目光远大、吃苦耐劳、大公无私等（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或是现实生活中“狡猾”、“自私”、“狭隘”、“封闭”等“品质”，这些无非都是对农民群体中十分复杂性格的一种“盲人摸象”式解读，它同时忽略了其所处不利环境和极度有限资源对他们“生存策略”所产生的互动式影响，因此农民显然没有一成不变的单一“本质”<sup>19</sup>。

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无论是强调平民视角和草根实践的乡村建设实践者，或是服务特定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学，还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经验总结，虽然通过不同的叙事表达，但为何可以达到如此一致的“本质化”效果？

如果说“策略性的借助本质主义”是一种在实践层面上争取更大空间的手段，那么不应把手段当成目标本身则是我们同时应该随时警醒的另一方面。

例如，当我们面对当前疯狂工业/资本化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时，作为一种策略，我们可能需要借助人们对传统农业的想象及对前工业时代那“田园风光”的乡愁式怀念，以突显出农业的生态环保功能，并促使人们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反思。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对传统农业和农村进行无限的“浪漫化”与“美化”，同样美好静谧的田园乡村很可能是极度的父权与家长式统治，也很可能潜藏着多少小脚女人的血与泪……所以，当我们进行“策略性”的使用时，还需要自觉地扣联到更大的社会脉络，进一步看到让这样的“反本质”叙述得以有效开展的限定所在——当所有资源和眼球都朝向城市时，我们所希望具有乡村视野的空间在哪里？

### 主流化的突围与诱惑

不论是社会运动中的妇女发展还是乡村建设，无疑都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呼声——“走出小圈子，通过主流化让自己的做法得到更大的推广，同时让更多人认同自己的说法！”。正如很多前来的志愿者和访客都不约而同地问我们，难道你们（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就不想着把你们的方法试验成功后，推向全国吗？面对着类似的提问或者指责，我们只能微笑着默不作答。

出来吧！为什么不呢！——既可能是“外面人”温柔的期待，也可能是不无

---

19 吴志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叙事——知青文学（1966-1986）研究》，薛毅编，《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 第457-458页

讥讽的怨气和指责，更可能是社会运动内部矛盾与不同思路之所在，由此产生的焦虑和压力，部分成为了内部分裂与内耗的动因，无疑是十分值得痛惜和遗憾。

当然，“出来”之后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摆脱“小圈子”式自娱自乐，可以摆脱自怜自恋的悲情出路，更似乎可能像一些由明星大腕成功运作的公益事业一样获得资本、公众、政府、媒体等在内的皆大欢喜。

NGO 内部，当然也绝非“净土”，外面社会存在的形形色色问题其间自然也不能幸免，略显特色的则是其间所形成的一套自我封闭式话语体系，不仅有各领域或机构内部的“专有名词”，更有各种基本共识。好的方面说，如此的一些共识多为坚持社会公义，为弱势群体说话，因此才易以“志同道合”聚起一批原来散落于社会各角落的理想主义者，并形成一种共同但于主流相异的文化。但不甚好的方面，这些人如果离开这样一个圈子的保护，将很难“适应”社会，同时这样的圈子久而久之，将“自我实现”为某种略带浪漫色彩的“乌托邦”。

且不说类似“内-外”二元对立的划分已经是本文立场所要质疑的所在，讨论 NGO 的“内-外”问题、是否要及多大程度上“农民化”更不是本文讨论重点。

我在这里只是想讨论，是否 NGO/社会运动的“主流化”会是如此的简单和单纯？更准确的说，需要进一步追问——什么是主流？是否只是“少数-多数”/“组织者-广大公众”/“试验-推广”的分别？是否只是组织者愿不愿或能不能挑战“清高自恋”这么简单？

现实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主流”的社会现实是如此的复杂，它包裹着如此多的社会文化冲突及不同群体间充满矛盾的利益诉求，因此需要进一步对这一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在此，我们先以女性主义自身的脉络为例。

如戴锦华教授所指出的：伴随着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欧美女性主义理论逐步被引进中国，然而这样的引进却没有任何第三世界或欧美少数民族的线索与脉络。仅仅被指认为、事实上也的确充当着城市知识女性的一种文化资源与文化行为，一种话语形式与表述<sup>20</sup>。而另一个有趣的同步现象还在于，当中国知识女性所代表的女性群体作为抗衡叙述再度浮出水面，同时发生的却是中国劳动妇女群体的社会生存图景渐次沉没于文化地表之下<sup>21</sup>。所以，在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重建过程中，对女性群体来说，则经历着或缓或急的群体分裂。女性群体不再是一个在无阶级的社会现实中可以相对简单、清晰整合的社会群体：一边是‘外来妹’，另一边是女企业家协会，一边是全职太太，另一边是下岗女工挣扎在贫困线下的艰难生存<sup>22</sup>。与此同时，具有某种社会

20 戴锦华，《岁月留痕——西蒙娜·波伏娃在中国》，《书屋》，2007年第10期

21 戴锦华，2006年，《性别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第24-25页

22 戴锦华，《阶级、性别与文化表演》，选自《差异与平等——香港妇女运动的新挑战》，新妇女协进会、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出版，2001，第279页

主义倾向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阶级议题、庶民研究中的性别议题、少数民族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论述，则几乎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讨论中的完全空白。<sup>23</sup>

而进入 90 年代的中国，其繁复的文化格局则被戴锦华形象地称之为“镜城”，一处文化的“共用空间”：国家、跨国资本、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在极端不同而间或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彼此剧烈冲突抑或“无间”合作<sup>24</sup>。与其说大众文化或大众传媒开始形成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不如说它比其他领域更为真切地展现出 90 年代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特有的“共有空间”特征<sup>25</sup>。

因此，在前后两个时代的互动与询唤下，“如果说八十年代，只是多少削弱了女性主义自身的社会批评力度与文化颠覆性，那么，进入九十年代，‘呼唤并构造中产阶级’，则令女性主义成了主流社会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其为有效介入社会阶级分化过程的合法化话语，用以淡化或遮蔽正在加剧中的社会矛盾与危机<sup>26</sup>。”

除此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外，女性主义自然还需要面对着更大的“主流”——“全球女性主义自身的机构化、学院化、‘NGO化’，以及迟到、却相当迅速、有力的女性主义学者的精英化与启蒙姿态<sup>27</sup>”

为体现上述引文中的各种“空白”——具有反省的女性主义直接介入社会议题，以实践对抗社会主流的定型化想象？本文以一场尴尬的遭遇为例。也正因为笔者曾以志愿者身份部分参与这场一直持续至今的真正公益活动，才认为如此一个生动丰富的例子，值得中国的社会运动内部深入的反思并获得启示。

虽然德高望重的高耀洁教授一直为本人所十二分地尊重，但我还是遗憾于——她竟如此武断地认为“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纯属一场骗局或闹剧<sup>28</sup>。原因是其及助手<sup>29</sup>质疑此举可能是借机拉点国际国内赞助，或利用自己（高耀洁）的名字行骗，更可能是那些公众从来闻所未闻的人物因获提名这样的殊荣而捐点钱。<sup>30</sup> 在另一份严正声明中，言者无疑忽略该活动本身试图重新定义“和平”与“平凡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贡献”这一可贵努力，充满挖

23 戴锦华，《岁月留痕——西蒙那·波伏娃在中国》，《书屋》，2007 年第 10 期

24 戴锦华，《隐形书写——90 年代的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 31 页

25 戴锦华，《隐形书写——90 年代的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 37 页

26 戴锦华，《阶级、性别与文化表演》，选自《差异与平等——香港妇女运动的新挑战》，新妇女协进会、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出版，2001，第 282 页

27 戴锦华，《温柔的挑衅——象征与真实的行动》，《读书》，2005 年 10 月

28 更多信息可参考陈顺馨主编，《多彩的和平——108 名妇女的故事》，2007，中央编译出版社及网上关于这场“骗局”的各种材料，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具体判断，本文暂不详述

29 在多份声明中，始终有一神秘的“高耀洁声明记录者”，一方面不愿透露姓名，另一方面不仅记录高教授本人言论，还以“记录者附注”的形式自己发出更为攻击性的言论。它无疑产生了混淆具体发言者的效果

30 参见《新语丝》网站 2005 年 10 月 10 日，《高耀洁的第一份声明》

苦与嘲讽地认为“带领村民自发建立起文化宣传队和秧歌队竟然都能获得提名去评选诺贝尔和平奖，实在令我大跌眼镜”！当大学生志愿者出来澄清时，更进一步被这位自称为“高耀洁声明记录者”讥讽为“这些大学生志愿者被人当猴耍了，却还蒙在鼓里一个劲为耍她们的人辩护，我真的觉得她们可怜”<sup>31</sup>。在第三份声明中，索性直接以“推选妓女评奖是对诺贝尔奖的严重侮辱”为标题，声明中更充满了如此的愤怒“……名单中竟然有一名妓女！我及中国区另外 106 名妇女是与一名妓女并列在同一名单中去参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而这样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的侮辱，更是对当年设立本奖的诺贝尔先生本人及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全体委员的人格和尊严的侮辱！因此呼吁其余的 106 名入选的中国妇女及评委中不愿与妓女为伍者同样发表声明退出该活动！”<sup>32</sup>”

虽然在网友和舆论的压力下，论者在随后一份澄清中认为自己不是歧视妓女，只是歧视将其合法化。且不说台湾“公娼运动”的是是非非，当我们在不很清楚的情况下，斩断他们特定的社会运动脉络，按照我们的标准，如此粗暴地进行审判本身就是问题！正如有网友进一步的质疑，“……如果有人以她（丽君，就是那位被认为‘耻辱’的原‘性工作者’）推动妓权合法化而与她并列为耻，我怀疑其根源还是基于丽君是个妓女，而不是因为她的任何意见，否则有人会以与其它主张妓权合法（比如：马英九、龙应台或其它很多大学教授都有和丽君相近的观点）的人士并列为耻吗？”<sup>33</sup>”

如此的“敏感”与歇斯底里无疑让我产生了如此之感触——在当下中国，所谓志愿者精神和社会运动的土壤还远没有形成！

重要的不仅是在“质疑”行为本身，更为意味深长的是，这场持续风波的“行为发出者”却是一直以来被我们尊敬为正义象征，为弱势群体奔走呼号的“中国抗击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教授，她同时也被出面澄清事实的当事人赵玲（志愿者）尊称为“高奶奶”的社会运动前辈！一种“底层关怀”为何会对另一种同样关注和支持草根实践的行为给予如此大的不宽容与攻击？是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了这样的冲突和想象？又是什么样的社会舆论环境放大了如此的矛盾？它满足了什么？顺应了什么？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参照系统？

正如香港媒体所指，“千名妇女争评和平奖”这一活动实际上同时开拓了两个战场，一个是挑战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而同时又不知不觉地挑战了妇女内在的秩序观和价值观<sup>34</sup>。

---

31 参见《新语丝》网站 2005 年 10 月 14 日，《高耀洁的第二份声明》

32 参见《新语丝》网站 2005 年 10 月 14 日，《高耀洁的第三份声明》

33 金色泡沫（网名），《一个台湾人对高耀洁先生“耻于妓女为伍”的看法》，2005 年 10 月 27 日《新语丝》网站

34 潘洁，《“妇女争评”活动的意义和教训》，《信报-财经新》（香港），2005 年 10 月 27 日

除此外，它更无意地挑战了占据主流思想文化界的新意识形态以及我们对传统社会运动的想象。

所以其引起的讨论，不仅攻击到只因发表讨论“和平”文章的《读书》，更有人将这次活动称之为“批判知识分子的超级幻想”，仿佛他们才立足于真正的“现实”。然而，就像一位哲学家说过的那样，在这个世界里，当有些人告诉你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告诉你：什么也不会改变，什么都是不可能的，你们歇着吧<sup>35</sup>！

“他们”为何会如此的愤怒？为何在如此炙热的批判声讨中，却几乎不触及活动举办者反反复复所强调的议题——如：底层妇女、妇女与日常生活、社会运动与“差异”、“和平”的真义……不仅这些核心议题被遗憾地逃脱，它们更被认为比起那些在没有任何调查和证据前说是否“贪污”、是否“骗钱”或是否有更大的“阴谋”来说，是“避重就轻”！！！！

一方面我们十分理解当现实社会中有如此多形形色色的骗局，社会运动内部也充满种种“伪善”“腐败”与无奈的“运作”，如此的推测与质疑也几近“正常”。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如此的遗憾，连社会运动人士都如此缺乏宽容、对事情所必须的起码调查和耐心、互相搀扶的同道精神，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寻找那“希望的土壤”？

在如此之主流与社会环境里，大家都已经习惯于去廉价地质疑一切，无论那是一种职业习惯、个人偏好，还是一种客观表述。以至于它充满矛盾的构成了这样的一个“荒谬和颠倒”的世界——人与人的基本信任必须靠证明；立足于最大的实际反可能被讥之为“乌托邦”；最质朴的表达也需要媒体来包装；最真心的感动仍可能成为另一个炒作的理由或罪证……更为可悲的是，比起“贪污、私利”来，“清白、无私”反而需要不断的自辩与自我证明，试问这样的“证据”从何而来？

而如此之“敏感”除带来“揭露者”之快感外，是否可能因如此的“质疑精神”让我们慢慢培养难得的独立思考与反思能力？我认为并不乐观，因为如此提问方式、所需要的“证据”及质疑理由已经被主流高度“同化”和“庸俗化”了，我们不难发现其间充满着主流的想象与矛盾，其所借助的只是“质疑”这样一种皮毛的形式，它同时也“替代”和“消解”了对社会和自我的真正批判与严肃反思。比如这场“骗局”风波的质疑者们一方面质疑为何不够“正规”——为何很多获奖者平时都名不经传？为何没有被媒体关注？另一方面又质疑为何过于“正规”——为何有很多获奖者是基层的政府人员？背后是否有官方背

---

35 汪晖，《读书》编辑手记，2005年11期

景？……

相比较起我们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时，面对各种来访者和志愿者，我们最经常被问到的无疑是：**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潜台词：是否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是？或者是特别的道德高度？我们其实特备想反问：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你们还能“活”多久？你们为什么能活？你们凭什么活下去？你们能改变中国的大环境吗？（潜台词：如果不是，就是乌托邦！）……

就像有人在前述“妓女可耻”讨论中所提出来：假如妓女的存在是可耻的，值得羞愧的是这个社会，而不是任何弱势者！当面对如此多的问题时，我们为何不应该去问问社会或我们自己怎么了？

而实际上很多质疑者或提问者心里早就已经有了答案，与其说是提问，不如是一种对自己观点的再次验证！——“别跟我谈什么价值/理想/正义/公正，反正都一样。”剩下的只是那更加浑浊的污水！

正基于此，我们必须清醒，当社会主流已经把许多东西污名化或同化时，我们还能天真地梦想“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当然不能，因为人民群众没有更多机会与资源，他们能接触到的只有主流资源<sup>36</sup>。

通过这样的例子，我们还需要看到**传统社会运动所建立的身份认同**，既是有效但同时也是有限的。因此，还需要检讨我们该如何想象并对待这个充满差异的社会运动及其间的多元诉求？**社会运动应该如何认识差异和内部矛盾？如何面对“他者”？如何避免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需联系到复杂的社会整体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社会运动的分析视角和判断标准需要改变！**

如果没有一种创造性的语言和资源，不管是女性主义还是乡建运动，其因接受主流的召唤诱惑而被吞没的可能性无疑是巨大的；如果没有不断的反身与有效的批判武器，其不仅成不了一种新的社会改良力量，更可能在当前犬儒主义和消费文化盛行之下，连原有的反抗资源都被彻底的吸纳和消解。

仍然需要再次说明，我们对主流社会的批判与警惕，并不等于另一种本质化的反主流；我们对主流社会仍然保持期待，同样并不等于“主流化”。如果遗憾地被误读，恰恰成功地再次落入“主流”的逻辑和想象之中。

### 作为“战场”的日常生活

面对如此的诱惑与吸纳，我们当然不能以主流“险恶”为理由，或“清高”或“精英”的完成某种简单的拒绝，否则就正如主流所命名的那样，在从“自恋”走向“自怜”中逐渐自我耗尽。

---

36 戴锦华，2006年8月22日夜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演讲录音，《迟到的分享——《蒙面骑士》导读》，黄国良整理

而女性主义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另一重要启示，就是理论和实践始终不分离。其之所以是理论，因为它要对抗一种叙述；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实践，因为它要改变那样的一种现实！所以，当我们在前文引述中发现中国脉络的女性主义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它也绝不能靠“继续引进不同脉络的女性主义资源或曰补足女性主义的全球视野、或者简单地加入阶级或种族维度，便可能予以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命题<sup>37</sup>”。更重要的是，需要恢复其理论与实践的有机互动关系，通过真正的实践，让妇女不止于获得平等权利或满足于别人的诉说，而是让她们获得改变自己生活的力量。

所以，我们需要关注并重新发现女性的日常生活，这既是她们真正熟悉的抗争“主场”，更是我们真正全面地发现她们之入口。如果说，对于时尚的城市中产阶级来说，日常生活可能是大型购物商场与郊区别墅；那对于笔者更希望关注的中国当代普通劳工女性（包括农村妇女）来说，从厨房到市场再到田间，无疑将是她们的日常生活，正是这样的新空间将是我们突破前文所述各种女性主义困境的新可能。

而这也正是“全球千名妇女争评 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发起人维尔莫·文高博士在访问中东、中亚、非洲多个曾被战争冲突蹂躏地区后的惊觉——富裕安逸的欧洲人，不是要居高临下赈济可怜的难民，而是要向灾难处境中表现坚强生命力的无数妇女学习！无论是战前战后的蹂躏，还是长期困厄的折磨，社群得以存活下来，靠的不是国家元首、政坛权贵、富商巨贾，而是默默无闻的平凡妇女那看似微弱却锲而不舍的努力<sup>38</sup>。

远的不要说，且看看我们的父母一辈如何在物质缺乏和只能“以劳动替代资本”的年代中生活，其中包含着同样的尊严、乐观、坚韧以及生活中互相帮助的温情，它无疑同样有力的让我们对那些现实生活中冷冰冰的“底层”叙述产生怀疑。

同样作为“战场”的日常生活还将改变传统对社会运动手段及所需资源的想象！我们既可以向外申请资金，也可以通过重新建立社区内部信任以从内部获取资源；我们既可以因为反对外部共同“敌人”而走在一起，也可能只是为了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而共同购买，在消费上实现互助……正是在这些新的认同与实践，它将让我们反思——当不认同某种东西时，“反对”是否是一种最好的形式？

进入日常生活，本身也是将“我们”与“他们”放在相近位置的一次调整，它试图扭转长久以来社会运动中始终存在着包括“研究者-被研究者”、“代言

---

37 戴锦华，2006年，《性别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第23页

38 刘健芝，《在寻常中闪耀的和平的希望——妇女的不言之教》，《读书》，2005年10月

者-被代言者”、“服务者-被服务对象”、“领导者-追随者”在内的种种不平等关系，在调整中不断地反身和挑战自我，并重新连接起社会运动的理论资源与本土实践。

## 后记：走出“悲情”

一次乡建骨干的交流会上，戴锦华教授在谈及当前墨西哥社会运动对我们乡建运动的启发时，曾经说道，世界上大多数的反叛运动与另类实践，多少都带着一种悲情色彩，正如有人说现在很多的NGO领袖都是悲情领袖。而她理解的这种悲情包含着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请看一看“我们”的不幸，正是“你们”陷“我们”如此的不幸，“你们”是如此的不义，这是一种悲情；第二种悲情是，“你们”多么无耻，“你们”有多少罪恶，“你们”的罪恶就成了“我们”的正义。历数对手的罪恶以成为一种斗争手段，当然可以，但敌手的不义并不自然地证明我们的正义，我们的正义是需要自己去建立、阐述和实践；而第三种悲情，“你们”看看“我们”做了多大的牺牲，你看看“我们”这些人是多么的高尚，“我们”做了很多“你们”不能做和不肯做的事情，这是第三种悲情……一方面，且不说在这样一个极端冷酷甚至不再“伪善”的世界，悲情是否有效？另一方面，一味的展示苦难议题，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在不断复制并“自我实现”着苦难的逻辑，更让我们悲观的忽略了苦难中人民的生命与创造，掉入前文所述的诸多问题。而一个社会理想状态的出现，从来都不是事先人们构想出来的，基本都是那些在绝望中的人们，或者说不甘心这个世界就这样下去的人们创造出来的<sup>39</sup>。

而笔者认为，当我们必须仰赖“悲情政治”来完成某种动员或自我认同的建立，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更为强大和说服力的一套说法与逻辑可循，更核心则是缺乏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对运动的态度及评价标准。

那么如何可以拒绝悲情，创造出另一种述说或实践方式，更准确说，即重新定位和认清我们的位置。墨西哥这场“蒙面运动”领导者马科斯所说的似乎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他说自己不认为玛雅原著民就是革命的力量，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正在做一场革命，那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正在做一场使革命成为可能的革命！换句话说，一个文化的革命，一个每个人用平常心、用平常事、用自己的方式去参与改变这个世界的努力，而这样的一种革命，才使得变革社会的革命成为可能<sup>40</sup>。

---

39 戴锦华，2006年8月22日夜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演讲录音，《迟到的分享——《蒙面骑士》导读》，黄国良整理，参考主要观点，有删改

40 戴锦华，2006年8月22日夜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演讲录音，《迟到的分享——《蒙面骑士》导读》，黄国良整理，参考主要观点，有删改

因此，在某些时候，当我们“左右开弓”的时候，不仅仅是获取一个必需的批判姿态，更是为打开一个新的空间与自我想象！

虽然一边不断进行“无情”和深刻的“左右”批判，但戴老师仍然坚持女性主义可能作为一种批判、实践或自省资源的价值，并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她希望在当代复杂的全球格局与现实文化政治地形之中，“女性主义，或许正是作为一种亚洲对话中或可借重的、他者/自我的语言，一种警惕、批判形形色色的霸权与男权的民族主义规划的批判利器，建构出一种不同的亚洲视野和亚洲想象<sup>41</sup>”。

原来听说“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感觉很好笑，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后现代的“学科游戏”。但是认真想来，既然社会矛盾高度混杂，其对应的分析工具和思考武器又岂能偏执于一方！而“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较有批判性的看待社会生产关系与环境的关系，其社会运动主体是自下而上的，同时这样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与理论思辨还带出——寻求另类的发展模式及寻求社会主义实践策略这样两重的意义<sup>42</sup>”它无疑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多维空间的反思与实践。

回顾自己接触女性主义的历程，原来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明确安全的位置，如今发现这种期待本身就是问题。正如洪子诚教授在总结戴老师为“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中所言——“‘女性主义’的身份、视域、理论，目的是要通过自我解构，来培育一种内在的、‘边缘化’的，不断发出‘异己者’声音的力量<sup>43</sup>。”

而社会运动的生命力正在于其不断与社会进行的互动与斗争中，任何思想资源和社会行动都不可能在“毕其功于一役”中安享曾经的“战功”！

二〇〇九年五月三十日

---

41 戴锦华，2006年，《性别中国》，台北：麦田出版，第26页

42 钟秀梅，《生态是永恒的经济》，《读书》，2006年5月

43 洪子诚，《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我的阅读史”之戴锦华》，《文艺争鸣》2008年12期